编辑故事



且探书道难与易

冬来，初寒。

10月，我两访西南，一次赴四川，一次赴云南。

这两年我常去四个省，除了四川、云南，还有江西和湖南，每次都是来去匆匆，但时间花费并不少。因为我怕坐飞机，大都是坐高铁前往，路上两天，而工作往往只有半天。但这次到成都我恢复了多年没有“享受”的卧铺待遇，一觉醒来就到天府之国，一点时间都没有浪费。想起1990年第一次坐火车到成都，几乎坐了两天两夜，便忍不住连叹今日“蜀道易”。

从今年开始，上半年到湖南、江西，这次到川、滇二省，我不再匆匆，而是反复流连，一是探访出版界老友和作者，二是详细了解各地方家对出版形势的看法。在成都，与韬奋基金会同仁交流了目前的出版人才问题，我以为越是困难时期越是要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与会者听后略有诧异；受老领导、中国版权协会周慧琳理事长邀请，我在中国版权协会与法律界、版权界、技术界的同仁交流了AI时代大模型使用作品的版权保护、生成式作品的法律问题以及对出版的影响。“1+1”大于“2”，大家互相吸纳对方的观点和材料，极有收获。

在成都还见到了老作者、成都市委党校退休老教授刘益飞一对贤、智伉俪。刘老师是江苏人民出版社的作者，我当初约他写《党建札记》，一印再印，在海内外取得很好的反响，之后他又投给我一部书稿，一直没有出版。他没有抱怨，认为可以再等等。刘老师思维敏捷活跃，观点犀利且深刻。10多年前，他曾得过中风，他多次给我讲中风后恢复的故事，令我无比赞佩，并将同样“对抗”中风有效的西北大学中国思想史名家、张岂之先生的高足谢阳举教授介绍给他，让他们成为“空中好友”彼此砥砺。他们俩都是与我价值观相投的著名学者，我今后如有可能写一本《我的作者们》，一定将他们写进去，只是不知道哪天才能启动写作计划。我目前受困于颈椎病复发，难以键入文字，让我对未来写作产生了悲观想法。

刘益飞老师夫妇在成都将他们珍藏多年的、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很有意义的一套书带来，说他们留着不如让出版人留着有价值。这让我非常感动，但我现在还不能决定是否收下。这段故事，也将是未来《我的作者们》的一部分，如果能启动的话。

我还去了云南，获得了从未有过的信心。我在先锋沙溪白族书局，目睹了一个乡村书店是如何营利并成为当地规模以上企业的；我拜访了百道网程三国夫妇，见证了他们的付出与乐趣；我在通海看到了作家杨杨的书房，这也是云南省品牌阅读基地“书林岛”的一处，我徜徉其中不愿离去：那是我看到最好的家庭书房（没有之一）。在先锋沙溪白族书局和杨杨家里，看到了很多写山的书。我因为拙作《山林城市》即将出版，对此极其着迷。

在与云南出版集团领导和出版骨干交流时，得知他们已从2023年的经营低谷走了出来，独树一帜地实现了三年增长，这极大地鼓舞了我的信心，回来与凤凰同仁们奔走相告。

本期我邀请了四川文艺出版社社长冯静写“AI时代如何做出版”的文章，以她出版的三本苏轼题材的书为例。这与我的四川行有关。她痛苦地在百忙中挤出时间所写的这篇回应时代关切的文章，让我很有同感。郎红旗总编辑撰写了他当初从北京一家化工厂到化学工业出版社做编辑的故事，聚焦“编辑要不要改稿、如何改稿”的出版大问题，不但有趣，而且深刻，对新老编辑都有启发。我和他相识于浙江出版协会的讲座上，一见如故，我当即约稿，他如约完成。

事有难易，即使它们是客观存在的，也取决于面对它们的人。

——主持人 徐 海

阅稿也是阅人

□郎红旗



郎红旗

都说“选组审编”是编辑工作的基本环节，也是编辑的基本功——验之我的职业生涯，深刻体会到此言不虚。当然，在图书销售高度市场化的当下，还应该加上第五个字“营”——通过营销工作实现图书经营之目的——也就是说这个“营”涵盖了“营销”和“经营”这两个既高度关联又有所区分的概念。

“选组审编营”，在编辑业务的整体实践中无法区分孰先孰后、孰轻孰重，但对于个体的编辑成长经历而言，往往是有先有后的。于我而言，作为入行新人的第一步工作是从“编”——也就是加工改稿开始的，由此奠定了我的编辑出版生涯。

1995年秋，在大学毕业后的第三年，我从北京的一家化工厂调入化学工业出版社。化工出版社历来重视编辑的培养工作，长期坚持系统化培训和以老带新、师徒传承相结合的培养机制。甫一入社，编辑室主任就给我指定了老师——任惠敏，一位同样有过化工厂技术工作经历的资深编审，同事们都尊称她为“任工”。当时，她正负责一套大型工具书《分析化学手册》的修订再版工作，已完成其第二版十个分册的整体规划，进入具体实施和细节落实阶段，各分册处于“选组审编”的不同阶段和交叉地带，工作头绪繁多，正需要人手。我这个新手恰好在这个时候出现，由任工带教的同时权且一用。

《分析化学手册》是系统总结我国分析化学学科发展和普及应用的一套大型工具书，作者阵容群星璀璨，几乎囊括了当时分布在科研院所和高校的所有学界院士。《手册》第一版由5个分册构成，于20世纪80年代出版，十多年之后，随着学科发展其修订再版提上日程。作为一个出版新人，一入行就赶上这样一套大书，圆了我学化工专业、做化工图书的梦想，一时倍感兴奋和荣耀。

认识出版流程，整理图书资料，熟悉编辑符号，练习加工作业……这些入门工作暂且不表，我接手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份编辑工作便是加工第二版《分析化学手册》的第一分册（《基础知识与安全知识》）。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个人电脑尚未普及，作者创作还以手写稿为主。我拿到的是厚厚一摞八开的绿方格稿纸，在桌面上小心展开，稿面上要么是一行行工整的手写字，要么是粘贴的印刷页（前一版可用的内容留存下来），在稿纸旁白处夹杂着作者的手写修正或补充内容，字里行间渗透着作者创作时的呕心沥血和一丝不苟。我按照任工的要求加工书稿，逐字逐句细心研读，用不同颜色的笔做修改和标注，遇到问题先自己反复研究或查阅工具书求解，实在无果再向任工请教，或者记录下来以备集中向作者求教释疑。在这一过程中受益于任工的悉心指导和自己的总结提炼，我的工作愈发顺利，感觉她对我的编辑加工也愈发放心了。经过三四个月，基本完成了书稿的初步加工，记录本上整理了存疑待解的问题和修改完善的建议，留待和作者进一步沟通解决。

随后，我们和书稿的主编单位杭州大学（后于1998年并入浙江大学）联系改稿事宜。1996年3月下旬，任工带着我背着书稿来到杭州，受到该分册的主要编者之一、分析化学教研室郭伟强副教授的热情接待。他安排我们住在校内的招待所，为便于我们工作，专门选了一套两开间的大房间，里屋由任工居住，外间权作改稿办公之用，夜间我就在此搭铺睡觉。经常是白天我们改稿审稿，把存疑的问题和需要修改的内容再一次交叉复核，集中整理出来，在郭老师等编者忙完一天的教研工作之后，晚间过来或单人或集体逐一讨论，当场解决一部分疑问，有些需要查证研究的问题则由编者做好记录，带回去深入钻研，第二天再做答复。如此反复，大概持续了一周多的时间，基本完成了整部书稿100多万字的修改和整理工作。我们和郭老师击掌相庆，彼此都为完成了一项宏大的任务和一次愉快的合作而满怀兴奋、感激之情。

这次加工和改稿的经历对我无疑是异常生动的“编辑实践第一课”。任惠敏编审对待书稿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的作风，指导后进时耳提面命、耐心负责的精神，和作者打交道时尊重礼让又有所坚守的态度，以及以郭伟强副教授为代表的作者群体所表现出来的学术精湛、学风扎实、为人谦和的学者风貌……这一切让我如此深切地感受到，在成就一本好书的过程中，编辑和作者的作用几乎同等重要，双方相得益彰——正是二者之间的充分信任和紧密合作，推动着一部作品如同优生优育的婴儿顺利诞生。这一体会和认识始终伴随着我此后的职业生涯，影响深远。

在一本图书的诞生过程中，编辑充当的角色是催生者、助产士，而非直接的创作者，因此，编辑要始终以尊重作者、敬畏书稿为本心，但又不能一味迷信作者，唯作者所言所写为真理，以至丧失自己的专业判断能力和合理质疑精神。在书稿处理过程中直至出版以前，编辑要清醒认识到自己所具有的独特身份——是把好最后一道关口的审稿编辑，是即将问世的作品的第一个读者。因此，要本着对读者负责、对作品负责的态度，以编辑必备的挑剔性敏锐嗅觉，以专业型读者应具有的批判性学习的眼光来看待书稿，求异存疑，推敲求真，就发现的问题、存疑以及修改建议，和作者在学术层面平等交流，有理有据地开展讨论，尽可能地优化和完善书稿。在这个意义上，编辑和作者可谓是成就一本好书的责任共同体。

得益于任惠敏编审和诸多作者的共识和协同努力，《分析化学手册》第二版（共十个分册）于1997年至2001年陆续出版。出版社将这套巨著列为重点项目，组成了老中青结合的编辑队伍，在生产调度和资源支持方面予以重点保障。《手册》出版以后备受好评，先后于2000年获得石化行业优秀图书一等奖，2001年获第五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我有幸参与了前两个分册的编辑工作，完成了“编辑实践第一课”，也使自己的名字首次印在“责任编辑”这一行。尽管后来因为工作调整，未再参与后续各分册及第三版的具体工作，但《手册》在我心目中始终是我编辑生涯的“第一部大书”。

《手册》的改稿过程固然是一段难忘的经历，但也并非所有的改稿都如此完美。编辑生涯中，遇到什么样的作者，具有高度的不可预知性。在我早期的编辑改稿工作中，也留下了和作者交往不甚愉快的一次经历，同样印象很深。那是2002年前后，我已调换部门转做生物和医学类图书。来自北京某三甲医院的一位年逾七旬的作者，把他在临床检验岗位上多年积累的资料汇编成稿，在和某家医学出版社合作不成的情况下，经我的一位作者介绍转投我社，我接了下来，他当时很感动，态度也很谦和。在完成前几章的加工、整理之后，我约请作者见面，就发现的一些实质性科学问题，以及医学名词的规范性、量和单位的合理表示等形式问题，进行交流讨论。这时，作者坚持己见、不肯通融的一面开始表现出来，一再声称他写的东西都是对的，不容置疑，更不容许轻易改动；对名词术语、量和单位的出版规范性要求嗤之以鼻，也不同意做必要修改。我没有完全让步，见面不欢而散。如是者两三次，双方只就小部分问题勉强达成共识做了修改。气急之下，作者声言要终止合作，甚至直接找到社领导狠狠告了我一状。当时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我甩手就把稿件退还给了他，请他另寻出版社。这时，另一位有经验、负责任的老编辑叶露编审出面做了转圜，她把书稿接了过去，费尽心思与作者沟通，对书稿做了妥善处理，最终使图书得以出版。

这段经历让我后来经常反思，一度自认为道理在我，后来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不足，转而越发钦佩老编辑处理这类问题的老到。其实，叶露编审也是一位出了名的工作严谨、坚持原则的编辑，但在面对这样的沟通对象时，善于调和与变通，在可改可不改之间取得了某种平衡。

编辑工作中需要阅书（稿）无数，其实也是阅人无数——编辑的工作看似是和书（稿）打交道，其实是和书（稿）背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有人说，编辑工作是一门艺术，从编辑工作实质上是与人打交道这一层来说确乎如此——和许许多多秉性不同、风格迥异的作者打交道，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施加影响并形成共识，以推动和成就一部又一部优秀的图书作品，这确实是一门艺术，而且是一门高超的艺术。

（作者系化学工业出版社总编辑）

三送“东坡”出门

——AI时代，我们怎样做书

□冯 静



冯静

这两年的图书出版，恰逢人工智能蓬勃发展期和出版转型期，读者对纸质图书的阅读需求，从销售数字看，是持续下滑的。对于当下的出版人而言，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经营压力。这也是我从事出版28年来，所遇到的出版被唱衰的高点。在这个浮躁、迷茫的时候，出版人需要看到发展的希望和光亮。

我清楚地记得，8月的一天，读到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总编辑徐海老师的《我的上海书展小结》，开篇第一句就让我很振奋，徐总把上海书展比成出版社的“延安”。这让我眼前一亮。在四川文艺出版社的会上，我常用红军长征的故事和“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等诗句激励、鼓舞大家和自己。读完后，我就给徐总发微信说：“这篇文章读后真是振奋人心。但每家单位的情况不同，感觉我们才从瑞金出发，还没打‘湘江战役’呢。”徐总鼓励我说：“不错，一年后就会到延安。”没多久，他又发微信说：“可否写一篇出版人的文章？”犹豫再三，我答应下来，结果因为各种事务，且提笔就感慨颇多，一直拖延下来，最后还是在出差途中，得闲将这篇文章完成。

三次启程，一个东坡

2025年到2026年，我与同事们先后送了三本“东坡”出门：《吾家蜀江上》《苏东坡美学漫步》《此心安处——一位美国汉学家的东坡行旅》。一本送东坡“回故乡眉山”，一本陪读者“走进东坡美学世界”，一本请一位美国老人“替东坡走了一遍中国”。三本书，三个维度，却指向同一个追问：在AI可以瞬间生成十万字“苏轼传”的今天，一个编辑还有什么不可替代的价值？

做完这三本书，我想我有了答案——AI是工具，能够让我们快速查询资料，能够提供策划选题的思路，能够让审校加快，能够快速生成宣传海报，等等。但是AI能生成文本，却生成不了现实中探索的脚步；能模仿文风，却模仿不了真挚的感情；能穷尽史料，却永远无法真正让人“心安”，更糟糕的是，AI时不时还有“幻象”，一本正经、逻辑严密地胡说八道。

回忆起来，这三本书的策划编辑过程都让我和我的团队不断成长、感觉到出版的价值和乐趣。

一、笨功夫：AI最快，而做书最慢。《吾家蜀江上》的出版，源于眉山市政协专家团队历时三年的倾力投入。3年，20余万字，数十幅珍贵影像，只为回答一个几乎无人系统回答过的问题：苏轼青少年时期在眉山的故事。史料缺乏、查询难度大，恰恰是AI最难补充的空白——语料库里没有的东西，大模型只会一本正经地编造。而人可以跑田野、访故老、翻方志，把“峨眉山到连鳌山”“老翁泉到玻璃江”一段段走出来、抄下来、核对清楚。记得2024年11月，眉山市政协副主席刘友洪和眉山作协副主席张生全专程来到成都，拿来《吾家蜀江上》的厚实的打印稿，我非常感动，然后说：“你们把稿子发过来就是，不用专程过来。”但儒雅的刘主席对我说，这是一本他们花了三年时间，由眉山七位作家完成的作品，希望当面交流。

在做这本书之前，我对眉山的印象就是“三苏”故里。见面后，我问：“这本书的独到之处在哪里？”刘主席介绍说：“关于东坡的书很多，但是关于其青少年时期的图书却是空白。作为东坡的家乡人，我们希望能够填补这个空白。”对此，我深以为然，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人的精神原乡，东坡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东坡、世界的东坡，和他的青少年时期自然密不可分。后来，这本书经过多番打磨，终于在2025年10月的天府书展上与读者见面。11月，在眉山市的东坡国际论坛关于本书的研讨会上，当时参加研讨会的200多位与会者，全程认真听完本书的作者和专家对谈后，还进行了非常专业的研讨，并争先表达这本书对于他们和家庭的意义和影响，我这才发现东坡故里的东坡文化底蕴之深，也深为自己是个出版人而骄傲。

我们常说“大家写小书”。《苏东坡美学漫步》正是如此：一位深耕人文社科数十年的学者、四川省社科院党委书记刘立云，一位中国社科院美学博士后卢加强，他们把晦涩高深的美学理论从学术典籍中“请出来”，放回东坡顶雨吟啸的烟火日常里，数易其稿。谈到“数易其稿”，AI一秒钟可以吐出十个版本，但那不是“易稿”——易稿是作者与自己的反复较量，是编辑在每一稿上批注、商榷、推翻又重来的过程，用我特别尊重的优秀出版人韩敬群老师的话来讲，是和文字“贴身肉搏”“耳鬓厮磨”的过程。

《此心安处——一位美国汉学家的东坡行旅》的作者比尔·波特更是“慢”的极致。这位82岁的老人，从眉山到黄州，从惠州到儋州，用脚丈量东坡的足迹，用大半生去理解一句“此心安处是吾乡”。这份行旅本身，就是书的骨血。AI可以检索苏轼生平，但它没有走过那片江水。

编辑的第一重不可替代，是替读者守住了“慢”的权利：慢工出细活，出的是真实的细节、严谨的学术、可靠的史识。

二、深功夫：把“死”的史料，编成“活”的人。三本书的共同追求，是让东坡从符号回到人，从抽象到具体，从庙堂到烟火人间。

读东坡，不能只把他供在祠堂里、刻在碑帖上。《吾家蜀江上》让东坡成为“一位会哭会笑、会种地酿酒、也会深深思念母亲的邻家少年”；《苏东坡美学漫步》以九大维度铺开一幅立体的东坡美学图谱，又提炼出“真、趣、和、达”四字内核；比尔·波特则用一个外国人重走东坡行迹图的观察的眼睛，重新看见一个中国人千年之前的心灵地图。

这种“活化”，正是编辑最深的心力所在。AI也能归纳东坡的九大维度——或许它归纳得更快、更全，但归纳不等于洞察。洞察来自编辑与作者的无数次交流，来自对读者焦虑的切身感知：当下社会节奏飞快，焦虑与内耗如影随形，我们才懂得东坡“在人生最幽暗的岁月里完成最灿烂的创造”，恰恰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精神资源。为正在成长的年轻一代，寻得一位有血有肉、可亲可学的精神引路人——是我们出版这三本书最朴素的初心。

编辑的第二重不可替代，是共情的能力：从文本里看见读者，从历史里看见当下。

三、真功夫：书是媒介，人是桥。一本好书的生命，一半在纸上，一半在读者心里。只有触达读者，一本书才完成了它的初心和使命。

《吾家蜀江上》自10月中旬出版，两个多月销售近万册。但比数字更打动我的是读者的反馈——有不少读者告诉我们，他们因为阅读了这本书，而爱上了眉山这座城。九百年前，苏轼在王家渡头写下“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九百年后，一本书让无数人循着文字去往那座城。此刻的《吾家蜀江上》，已经成了眉山一张独特的、有底蕴的文化名片。

这正是编辑要做的第三件事：把书编成一座桥。桥的这头，是眉山的竹影、黄州的江月、惠州的荔枝、儋州的椰风；桥的那头，是每一个愿意在生活里寻找诗意的人。AI生成的内容是终点式的答案，而好书是开放式的邀请——邀请读者动身、抵达、感受、爱上。一本书的运营，本质上是一段关系的持续经营，这同样是AI不能及的。

时代之问：AI时代，编辑何为？

三本书做完，我常想：AI时代，编辑的价值究竟是什么？

我总结为三个“不能及”——

AI不能及的“实”：三年田野、数易其稿、多年行旅。真实是走出来的，是跨越时空和自己的体验融合出来的真情实感，不是智能体生成出来的。越是AI时代，人倾注深情书写的文本，越是稀缺。

AI不能及的“情”：我们常说，文学是人学，一名好的编辑懂作者的深情，懂读者的焦虑。选题的眼光、共情的深度、对“此刻中国需要什么书”的判断，是“人的心”体会到的“人的心”。文学貌似是无用之用，但无用之用，却可大用。

AI不能及的“诚”：我们做出版的人，最珍贵的事情，就是把老先生背着行囊、踏遍山水的脚步变成书页，让更多人看见，感受到，并转化为人生前行的力量。这份把书当作文化名片、当作精神桥梁的使命感，是算法永远学不会的人文姿态。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九百多年前东坡轻轻一问，问的是忙与闲、技术与心灵。今天我们围坐一堂继续做书，也是一样——机器越快，越要有人愿意慢下来，沿着东坡的美学足迹，在大脑里、在大地上，慢慢地走一走。

最后，用一句理性的话来结束本文：现在，我们这一代出版人，正在走自己的出版转型“长征之路”，希望我们每一位，都尽快抵达“延安”。

（作者系四川文艺出版社社长）